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帝吧出征事件分析

李红梅

摘要

本文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并探讨了官方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消费民族主义的相通和区别之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民族主义。接着，文章研究了与民族主义所应对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并指出现代中国通常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摇摆。接下来，本文以帝吧出征为例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从很大的意义上说，帝吧出征不仅仅是一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宣泄，更是一种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这种表演不仅根植于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且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中国文化、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身份认同等）的一种应对，是国内和国际力量，政治和经济文化以及官方和民间因素的一种结合体。

关键词

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的现代性、普世主义、帝吧出征

作者简介

李红梅，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传播学副教授。电邮：lih19@miamioh.edu

How to Underst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D8 Expedition”

LI Hongmei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nationalism in China. It situates the analysis in China's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between political nationalism and consumer nationalism. The essay first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since the First Opium War in order to provide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is followed by an

investigation of cosmopolitanism. I argue that modern China often swing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After that, the essay analyzes the “D8 Expedition” to explore the specifics of online nationalism. I argue that the D8 case is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ism but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identity politics that is embedded in consumer culture and global geopolitics. Such a performance is not only rooted in our selective memory of history, but also asserts China’s po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at is sometimes characterized by frustrations and resentment. Thus, nationalism in China converges local and global forces,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official and popular elements.

Keywords

Nationalism, Internet Nationalism, Chinese Modernity, Cosmopolitanism, “D8 Expedition”

Authors

LI Hongm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Email: lih19@miamioh.edu

一、前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稍微远一点的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导弹击中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当场致中国的三名记者死亡及数十人受伤。尽管美国声称是误炸,但是仍然引发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各省会的一系列的反美大型游行示威。

2001年4月,美军的一架侦察机和中国的一架反侦查战斗机在南海相撞,再次引发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游行。2005年,由于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以及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成员,中国很多大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遭遇异见人士的抗议,由于法国警方应对不力,国内网民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抗议。2012年日本提出将钓鱼岛国有化,激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并再次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各种示威游行。

2015年底,台湾艺人周子瑜在参加韩国一档综艺节目时,挥动中华民国国旗,此事经由台湾艺人黄安在2016年1月8日通过新浪微博曝光而引起中国大陆的网民和广告商的抵制。后续的民族主义事件还包括中国网民在虚拟空间自行组织起来,以帝吧的名义出征脸书(Facebook),刷屏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的脸书主页,并同时攻陷了当时的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脸书页。帝吧出征者通过各种影像、文字、刷表情包进行自我身份表达,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最近,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主权争议,也随时成为激发民族主义的引子。

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仅显示了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叙事表达方式，而且这种势力从政治范畴延伸到社会和文化参与的各个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近年来网络文化的兴起，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这种热情参与又与网民对现实的各种不满交织在一起，因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本文试图理解这种现象，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解释产生和延续这种现象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在中国的拉锯。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应该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下来理解；我们不仅要理解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和西方的关系，也要分析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处理自身文化和传统的关系。即，要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本土和全球构织起来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寻自我定位的一种表现。另外在探讨网络民族主义时，我们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网络确实让很多具有相同观点的人聚合在一起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也要看到网络并不是产生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催化民族主义的工具。正确的看法是将网络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来理解中国现阶段的网络民族主义。

二、什么是民族主义？如何理解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有多种意义，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对民族的认同。民族主义通常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感以及对民族的一种情感皈依”（He & Guo, 2000）。学者通常将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明确地区分开来（Gellner, 1964, 1983; Giddens, 1985; Anderson, 1991; Duara, 1993）。民族可以理解为一群具有共同的渊源、祖先、语言、宗教和地理的人群。民族国家通常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个政体，比如日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不一定构成国家，国家也不一定是由单一民族组成。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西方学者（比如 Gellner, 1964, 1983; Anderson, 1991; Duara, 1993, 1997）明确提出民族不是先于民族主义存在的。恰恰相反，对民族的想象才构成民族形成的基础。即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通过传播和媒体建构出来的。Anderson (1991:3) 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具有边界和主权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是因为在这个共同体生活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认识其他所有的人，而是通过媒体和大众传播制造一种共同的经历，来维系共同体中的人们通过想象制造的一种

纽带、一种共享的情感和经历。Anderson指出印刷媒体在制造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共同想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如果将Anderson的理论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大众媒体（如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广告媒体）对制造共同的想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网络媒体所起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在全球范围内，大众媒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读者群和受众越来越下滑，更多的青年选择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中国也不例外，网络 and 手机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

尽管中国的民族历史形成与欧洲有一定的差别（比如，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就由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不是像欧洲在18世纪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靠想象的情感来维系的。中国人通常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或华夏民族。中国的四大文明常常被用来作为国家曾经辉煌的历史印记。这种通过教科书还有各种传媒手段编织的民族想象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并取得认同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解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包含了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去理解自身，也包含了中国如何去理解自己和他者（尤其是西方）的关系。Duara (1993)指出民族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概念、一种呈现竞争性的场域、一种不断变化的话语权。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包括对历史素材的选择、重组、重新创造，以服务当下。Duara (1993:9) 讲道：“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不停地重塑自身的身份认同。所以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中国和他国的动态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去看待、认识和建构自己和他者的关系。

许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官方民族主义(e.g.,He &Guo,2000; Zhao,2000; Hughes, 2006; Shirk,2007)。通常来说，官方民族主义通常是对内部或外部压力的被动反应，并成为一种维持政权的工具(He &Guo,2000; Zhao,2000; Zhang, 2001;Gerth,2003;Shirk,2007)。这也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两种面孔紧密相连：一种是理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而另外一种是不理性的被动反应 (Shirk,2007)。Gries (2004)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始终是两个相反情结的组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的受害者情结，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反帝的最终胜利而引起的胜利者情结。比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这种胜利者的叙事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两个情结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对西方大国和日本的民族意识。笔者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也谈到中国在反抗日本和西方强权的时候涌现了各种的意像、符号和人物，以及中国历史

上各个时期的民族英雄组成了丰富的资料库供民族主义者使用；现阶段中国在科技领域如神州飞船、主办国际活动以及体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如奥运会、世博会等都已经成为民族荣誉的一部分（Li,2008, 2010,2012, 2016）。但是一旦中国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国际媒体公平的报道或者中国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部分民众，尤其是中国的网民又会回到一种受害者情结；并且，这种受害者情结也是与西方社会流传的“中国威胁论”相生伴生。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主义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具体到中国，中华身份认同可以涵盖四个方面（He & Guo,2000）：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生活在大中华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汉族的身份认同；中华身份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中华身份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所有说中文和认同中国文化的人都包含在内。确实，现阶段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即任何认同中华文化的人都可以被算作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国现在讲有56个民族，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涵盖的不仅仅有汉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这种程度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也包含了一种普世主义的元素。确实，普世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中国身份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三、普世主义

中国的社会认同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现阶段也涵盖了世界主义。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is the Cynic）（404-323 BC）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关注“内心世界的德行和思想”的普世主义政治身份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Nussbaum,1997:57）。康德（Kant,1795）在《永久和平论》（Towards a Perpetual Peace）一文中提出关注世界人性和社区的道德哲学。康德认为我们的道德价值应该不仅包括自己的社区而且包括整个人类社会。Nussbaum（1997）指出世界主义是一种身份认同，即人们不仅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本地社群的人而且是关注整个人类共同体。世界主义者有意识的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放入自己的价值观中。

尽管表面上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作是身份认同的不同方面。Duara（1993,1997）指出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怀揣着世界主义的理想。确实，由于现在的世界是由独立主权的国家组成，民族主义本身也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常提到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国文化长时间中都包含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元素。中国的道家、儒家思想、中

国官方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都包含了包容其他不同文化、跨越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根据儒家思想，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任何非汉人只要掌握中华文明的知识 and 汉民族的礼仪都可以被称为汉人或中国人(Duara,1997)。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69)指出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和乡绅推崇的道德价值和文化是一种世界文明的道德和价值。只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因为经历了一系列的战败，才开始慢慢接受以一种更加具有派别的意识来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以及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即，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西方传入的产物，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附带品，而且这种附带品和种族主义是相生相随的。

从文化生产的角度上来看，普世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第三空间”及各种文化的融合。世界主义不仅和最近几十年经济的迅速全球化而引起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流动相关，而且也与想象的产生紧密相连。Appadurai (1996) 指出文化全球化可以从五个维度来理解：人口、媒体景观、技术、金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全球流动。大众媒体尤其提供了一种塑造自我意象的资源。这表明现在的文化版图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塑的。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国家身份认同之外创造其他文化身份和想象。中国的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引进国外的节目（包括中央电视台早期和美国签订的以广告换节目的计划，以及日本的漫画、卡通片等），中国的媒体一直受西方、日本和港台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告行业，国外的影响尤其重要（Li,2016）。这些都进一步塑造有别于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意识。

世界主义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由于全球交往加深而出现的一种后现代形态。有学者（如Norris, Inglehart, 2009）研究了在何种媒体体系下面，人民容易形成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在何种媒体体系下面，人们容易形成一种狭隘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化并不一定促使人们形成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当下全球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同时也看到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升温。Manuel Castells (1996) 也《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一书明确地谈到全球化在某些地区引起的民族主义反弹。鉴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对在地化和全球化的一种应对，De Kloet and Jurriens (2007:12) 在编著的《世界主义爱国者》(Cosmopatriots) 一书中提出普世爱国主义的概念，以使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可以调和“在地和迁移、根植于某种地域以及非地域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公开性以及与地域空间相连的在地性。这样，民族性和世界性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与民族主义一样，世界

主义在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其“通过形成消费主义身份，以超越地域的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全球意识” (Rofel, 2007: 11)。

四、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胜利者和受害者情结

如前面所说，要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很大的程度上讲，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和中国堕入半殖民社会是相生相随的，这促使中国对自己的传统产生了一种矛盾心态：有时否定，有时肯定，有时在否定和肯定之间摇摆。而这种心态也与前面所说的中国的受害者情结和胜利者的情结密切相关。胜利者情结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影视、图书以及官方文化宣传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从而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庆贺性的宣传。而受害者情结可以追述到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并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致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社会。

外国的侵略严重地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央大国”心态。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拯救国家的方案。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庭的开明官员和地方绅士开始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但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及其他原因，洋务运动失败了，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中日海战失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长期以来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一直视日本为中国的学徒，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得以统一并迅速西化，导致日本国力迅速强大并超越了中国。美国学者James Reeve Pusey认为这次失败导致了知识分子“一种新的无以比拟的忧虑、挫折和愤怒的民族情绪”（1983: 5）。James Pusey (1983: 201)总结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如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慢慢意识到中国在武器方面落后。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现在，梁启超和严复指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学者也是落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整个文明都是落后的——因为中国的祖先是落后的。这种失落也许比19世纪的西方人在后达尔文时代失去对祖先信仰的〔宗教信仰〕更加具有创伤性。

Pusey的言论显示了中国在和西方交往中的创伤性经历。严酷的现实逼得许多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尽管这引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渴望，但是也同时导致了对中国的价值和传统的全部质疑和颠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几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甚至很多人主张全盘西化。尽管一些士大夫如辜鸿铭和王国维希望通过复兴儒家思想使中国强盛,但是他们的声音在时代的大潮中成为了少数。伴随着中国的衰落,各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包括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个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变强大”。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是主要问题,现在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和主流意识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伴随着一系列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卑劣论开始在中国文化中深深扎根。正是由于中国落后,所以知识分子崇拜西方(及日本)的实力。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以及其他运动都是改良派希望通过接纳西方的制度以使中国强大起来。史书美(Shu-Mei Shih)(2001)研究了1917到1937年半殖民社会的中国,她指出中国的现代主义者通常将西方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效率、新思想、理性、民主、个人自由、世界主义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而将中国与落后、集权、家长制、迷信以及虚弱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二元思维的集中体现:科学和民主成为反对中国传统的两块招牌,而中国的传统和文明是必须要打倒的。受过西方或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著名学者如鲁迅、胡适、闻一多、陈独秀、钱玄同都呼吁拥抱西方文明作为中国自强的手段。尽管五四运动给中国注入了一种新鲜血液,但是运动对传统的无情鞭笞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人的不自信和失落。由于将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被认为与现代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是需要淘汰的。自此以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时往往在一种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的情节之间徘徊,而不能客观、如实地看待自己和西方社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表面上看是中国希望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讲,中国实际上也是在为西方的现代化背书。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线性逻辑,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抛弃了中国的传统,希望通过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Gillett(2000: 14)指出,不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现代化主要是通过物质的发展来衡量的,而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文明’是伴生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

五、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主义升温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向资本主义世界靠拢。从此以物质改善为基础的政策受到大力吹捧。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由于中外巨大的物质差距、以及中

国知识分子对外部知识的渴望，西方的制度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想迫切地了解西方，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五四精神。伴随而来的不仅是对中国文革的批判、而且是对中国传统，包括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希望改良社会和文化的渴望，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比如，中央电视台于1988年播出的六集电视记录片《河殇》批判了中国的“黄土地文明”，推崇西方的“海洋文明”，从而希望中国能够挣脱以前的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束缚，拥抱西方文明，建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河殇》热情地赞颂了西方进步的、生机勃勃的海洋文明，而无情地批判了中国的毫无生机、过时的黄土地文明。这种论调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者对传统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悲观。尽管总撰稿人苏晓康后来指出该片对中国和西方的刻画太简单化，但是其体现的主要观念在中国仍然有影响力。《河殇》在中国的播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电视节目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89事件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现行的文化和政治。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战略，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执政的合法性。中国政府自此实施的政策集中表现为经济上逐步放宽，而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强化威权统治。中国的经济政策集中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Harvey, 2005；Wang, 2003），即减少控制、私有化、用市场的理念来配置资源以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控制和引导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这种官方的引导和民间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渴望进一步结合，使得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强。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宽松政策自然而然地引导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士、官员远离政治，积极投身商海，以期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另外一部人知识分子（就是经常被称为的新左派）更加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通过批判西方、康复传统来抵抗西方的文化。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官方并不是一味地支持新左派，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密不可分，当新左派和国家利益发生分歧和不一致时，新左派一样是被压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乌有之乡网站的兴起和衰落¹以及知识分子和大众对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截然不同的评价。

俄罗斯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加强了执政党和中国精英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促使执政党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建设。比如江泽民2000年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

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信仰危机。江泽民提出坚持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这种对中国前途的焦虑以及对共产主义没落的担忧使得中国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在国际领域，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²，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失败，是“海军之耻”。此次事件也集中引发了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从此，中国媒体和主流思想认为美国借此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另外，1993年北京在申办奥与会时，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也引发了对美国的不满。一些中国媒体批评美国众议院在北京申奥期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同时，中国和美国在台湾、西藏、天安门事件（所谓的三个“T”问题，即Taiwan, Tibet and Tiananmen）以及人权上的不同看法也产生了很多的外交摩擦。现实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对美国的霸权的看法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表现为官方和民间的结合，政治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的统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本书批判了中国人对美国的膜拜、美国的虚伪、霸权、个人主义、及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往往是美国国内政策的替罪羊。这本书称赞了古巴抵抗美国的勇气，指出日本需要对二战时侵略中国进行赔款；而且日本作为美国的代理人，无权申请联合国安理会职位等。必须指出，整本书由五个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很多的资料来自于报刊和大众读物，其目的是为了赚钱。本书迅速地成为畅销书，销量高达四百万册。这本书引发中外媒体的讨论，被译成多国文字。尽管本书是由书商策划，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赢利，但是其立场与官方是一致的：即在考虑中美、中日关系时，应该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并且推崇能从“情感、直觉上感受到的东西”。本书中对西方价值的批判，对美国 and 日本的批评与90年代兴起的批判对外国强硬的“软骨头”“汉奸”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Lin & Galikowski, 1999: 161）。

《河殇》和《中国可以说不》对中国文化和现行制度以及中国的未来所持有的观点非常不同。《河殇》希望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走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可以说不》基本是和主流价值站在一起，赞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而显示更多的文化和政治主体性。自90年代以来，尽管在传媒领域仍然能看到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是政府更多的是倾向于批判西方来构建现行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

法性。这种倾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国家的积极引导，也可也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失望，进而希望借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到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Lin & Galikowski, 1999)。

六、中国近年的民族主义呈现

近年的民族主义事件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主要针对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反对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比如日本没有对中国就二战期间的侵略正式道歉，并且还在不停地篡改历史；另外就是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当然这也牵扯到美国。因为美国在二战以后托管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美国根据1971年归还冲绳的协议中，将钓鱼岛归还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八十年代因为共同抗击苏联的需要，曾出现过一个比较短暂的“蜜月期”。民间和官方对彼此都相对比较友好，但是89风波以后，中国政府遭到了西方的指责和军事、经济制裁，中美关系从此在一种爱恨交织中进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也经常视美国为主要敌人。

第二，大体上来说，政府对民族主义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从近年一系列的民族主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开始的时候政府往往持一种宽容或鼓励的态度，但是一旦运动有失控的危险时，政府会进行控制³。这种处理方式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三，我们也可以将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看作是中国应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一方面，从美国和西方传入的影视文化和信息，以及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传播表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也意识到中国不能盲目地模仿西方。并且，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挫折和误解很容易通过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和中国的消费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理解。张旭东（2001）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语境中遇到的挫折。一个浅显的例子是中国的民众了解的西方是中国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建构的西方。普通民众的理解受主流媒体的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以及是否有别的渠道自己去了解信息。在目前的媒体制度下，绝大多数的民众对西方和对中美、中日关系的见解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影视作品中，中华民族百年苦难史、西方列强入侵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尽管新媒体技术（尤其是网络、手机和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媒体垄断信息的局面，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由于信息来源有限，很容易直接诉诸于民族主义来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强劲的消费能

力,使得中国的民众更加自信。中国的城市出生的80、90后基本上是在一种物质相对富裕的条件下长大的,因此就更加会自信地张扬自己的中国国族认同。

七、消费民族主义

自1990年以来,消费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部分 (Li, 2008, 2009; Wang, 2005, 2006)。消费民族主义是与扩张的全球资本紧密相连的。王坚 (2005:225) 对消费民族主义的定义为“个人在消费过程中激起的集体的民族意识,从而以此喜欢或者是拒绝别的国家的产品”。购买国货或者普遍意识上拒绝外国产品都可以算作消费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受益于全球化,这种民族主义在中国并不一定意味着抗拒全球化,而是反抗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公平待遇。

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紧密相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的表演,它们和传统媒体的式微以及新媒体的壮大引发的大众的参与紧密相关。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了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关系,比如,中国的广告不仅贩卖民族主义,也贩卖世界主义 (Li, 2008; Li, 2016)。不仅中国的公司将民族主义作为销售策略,跨国公司也如此,这种趋势在2008年中国的奥运会之前和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民族主义的表演成为投机、获取利益的手段。一旦民族主义不灵,商家便迅速的调整手段,用其他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方式营销。奥妮洗发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奥妮在90年代中期强调其国货定位以与跨国品牌如保洁和联合利华抗争,但是发现消费者并不买账时,迅速调整策略,希望以印度的异域文化和意像来竞争。李宁作为一个民族品牌,也是一直在贩卖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摇摆,其口号“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李宁”展示了一种向外扩张的情怀。尽管李宁在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短暂的辉煌,但是它在面对跨国品牌如耐克、阿迪达斯、纽白伦,而且李宁本世纪初开始的国际扩张一直很不顺利。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李宁的广告策略倡导“中国人让改变发生”以此回归作为民族品牌的传统。

在帝吧出征事件当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消费文化的影响。首先,不仅网民所用的文字和符号很多来自大众媒体(比如黄子韬、尔康等),而且网民明显地将商业文化赋予了政治内涵。比如网友在奉上黑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时候,明确地写上“你们淘宝的时候,还不是乖乖选择台湾省”。因此淘宝等中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成了民族骄傲的象征。而且和历次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网友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消费实力来抵制不认同中国的元素。比如,由于网民对周子瑜以及对JYP

娱乐公司的抵制，周子瑜的手机广告代言被撤销，TWICE在中国的预定演出被取消，致使JYP娱乐公司股票大跌，市值蒸发高达600多万美元。迫于压力，JYP娱乐公司安排周子瑜录制视频公开道歉，声称“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此次事件与网民抵制赵薇导演的新片《没有别的爱》中的男主角戴立忍是如出一辙的。由于戴被认为参加了台独活动，遭到网民炮轰。尽管戴发文道歉，但是剧组还是撤换了他。并且，消费文化在中国催生了各种对权威的解构，并以轻松、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对图片的各种挪用（appropriatio）、混搭（remix），而且也体现在网友通过美食、美图欢迎台湾网民到大陆来旅游，由此希望通过物质文化的意象来传递共同的文化联系和纽带，以此强调超越政治边界的以消费文化为基础构建的“共同想象”。

八、网络民族主义与帝吧出征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截止到2016年6月，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7.10亿，6.56亿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农村网民1.9亿，城市网民5.2亿；男女比例为53:47，这与同期的全国人口男女比例（51.2:48.8）大体一致；10-39岁的网民占74.7%，并且20-29岁的比例最大，占30.4%，30-39岁的占24.2%；而且学生、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是最大的上网人群（CNNIC, 2016）。具体到帝吧出征事件，不仅有国内的网民，而且有海外的留学生参与其中。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的累计留学人数达到404万人，2015年正在留学的人数达到126万人，仅仅是2015年当年就有52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人民网，2016）。在日本也有近10万中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在出国以后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与国内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留学生是翻译文本的主力，由于时差关系，被称为“时差党”。

在谈到这此帝吧出征以前，笔者想简单地谈一下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台湾本土运动的崛起和台湾有线电视频道、新媒体技术以及其他媒体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后国民党才光复台湾。国共两党的内战迫使国民党逃到台湾。自此以后，台湾和大陆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对抗。同时，台湾本土力量开始兴起，很多的早期台独人士是在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劲草，2015）。李登辉的上台标志着台湾本土势力渐渐进入主流。2000年民进党主席陈水扁就任中华民国总统，进一步推行台湾的去中国化运动。台湾的去中国化运动在马英九2008年当上总统以后有一个相

对缓和，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马英九和习近平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的“世纪握手”。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民众希望能与台湾民众多交流，但是地缘政治、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角色都使得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在政治层面充满分歧。台湾的去中国化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希望构建另外一种想象，“台湾人的台湾”，他们通过教科书、媒体和政策割裂与中国历史纽带，以达到真正建立一个独立政体的目的。而且，尽管台湾有高达97%的汉族人，可是近几十年的本土化运动让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越来越少，而认同台湾身份的人越来越多。比如2014年台湾政治大学公布的民众调查显示，有高达23.8%的台湾民众倾向台独或希望尽快台独；60.4%的民众仅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32.7%的民众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但仅有3.5%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台独和台湾人的比例达到自94年以来的新高（严思祺，2014）。

在大陆民众的心目中，经济发展可能自然吸引台湾向自己靠近，但是台湾的发展导向与大陆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自己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同时，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的占中事件都让内地的民众，尤其是网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中国这一代年轻的网民不仅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且中国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也普遍被民众接受，即主要以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待身份认同和政治问题。这使得中国民众对自己的身份和国家认同越来越自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误以为台湾民众不认同中国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不了解或者是精英、媒体、政客、台独投机分子的误导。帝吧出征正是需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去理解。

网络在引导、塑造、制造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些网民通常用一些极端的言论博取眼球。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端言论的放大器(Wu, 2005)。一些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可能被视为是一种主流，从而放大此类言论的影响。在近年的民族主义事件中，网络在组织游行和关注、讨论、发动网民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的参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黑客攻击了美国、日本、台湾和北约的网站；由于中国政府和这些组织冲突，黑客声称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战(Chao, 2005)。2005年数以万计的抗议者聚集在中国的十多个城市，抗议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游行大部分是通过网络、手机和短信来组织的(Gries, 2005; Shirk, 2007)。由于网络 and 手机已经变成了中国网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技术在组织游行、传播信息、制造话语、塑造社区以及身份认同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以及各种网上社区在传播和塑造民族主义话语权和身份认同上不可或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对钓鱼岛、台湾和南海

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议题。

具体到这次帝吧出征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往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民族主义者关注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而且在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日本和美国是危害中国主权和其他权利的首要敌人;几个不能碰触的底线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钓鱼岛以及南海问题。由于日本与美国(如《日本和美国共同防守和安全协定》),台湾与美国的关系(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这势必会造成美国在亚太区对中国申张主权和利益扩张进行牵制。而且由于日本过去对台湾的统治,有一部人台湾人对日本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一方面希望台湾能念及同胞情谊,共同维护华人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台湾的本土势力崛起和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渐行渐远一种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厌恶。台湾被认为是美国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棋子。台湾本土势力民进党2000年首度执政,推行愈来愈明显的“去中国化”政策,这对长期接受“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中国大部分民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网民试图强调“文化认同”、情感共鸣和集体行动。首先他们强调组织纪律性。帝吧,百度人气最旺的贴吧,大概有2千多万用户。在过去十多年中,这个贴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事规则和组织动员能力。这次行动,在总群之下,共分6路纵队,除了1路先锋队部队外,还有5路后援保障部队,分别负责情报工作(收集台独言论和图片);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帖招人);武器装备工作(制作反台独图片和言论);对外交流工作(时差党加反台独外语翻译);战场清理工作(专门举报、到脸书点赞等)。并且明确提出“文明用语,不发黄图,反台独不反台湾人民”。帝吧出征公布了使用的模版,王喆(2016)对帝吧事件的研究表明1月20日19:00-20:00,蔡英文的Facebook留言有6个模版在两天之内达到峰值,包括八荣八耻、义勇军进行曲、余光中的乡愁、歌唱祖国、七子之歌和帝吧出征。这样既在短期内形成了对台独的威慑,又让参与者有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他们强调“非暴力”和“理性”表达,因此希望和辱骂台湾的暴力留言划清界限。尽管参与者前期以军事化的意象和语言(如“出征”“圣战”等)和台独斗图,但是后期主要是以一种情感交流、柔性表达为主。这也给他们的出征打上了“小粉红”、女性化文化的标记。比如,王洪喆、李思闽和吴靖(2016)认为帝吧出征代表了互联网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即“网络亚文化和粉丝群体”催生的民族主义。

具体到信息的传递方面,参与者希望表达一种自豪感和对去中国化的不认

同。比如，他们借鉴八荣八耻，指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他们传播余光中的《乡愁》呼唤台湾同胞“回家”。指出“七娃只是被妖精迷惑了心智”。他们在表达希望两岸可以和平相处的同时，也不忘传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及大陆民族主义中的父权和霸权，将大陆作为父亲，将台独作为不孝子（王喆，2016）。以及通过美食、美景图片传递对台湾人民的爱，比如网民贴出欢迎台湾人民到某地（如河南、杭州、上海、重庆等各地）来游玩的照片，不仅列举了中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将台湾和中国的省市放在一起，再一次支持了中国的官方立场。

第三，和中国的历次民族主义风潮类似，这次事件仍然可以看作是一次被动应急反应。周子瑜事件在1月8日以后就开始发酵，后续的行动完全是因为网民对周子瑜和JYP前期的傲慢态度引起的。而且官方媒体和网民参与互相强化。比如周子瑜道歉，中国的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网民的胜利。1月15日拥有4315万粉丝的《人民日报》微博写道“涉台周姓艺人道歉了。面对韩国公司的‘打马虎眼’，粉丝喊出先国家后偶像，而即便现在双双致歉，公众形象一时恐难以挽回。其实粉丝并非愿意让娱乐政治化，也绝不希望娱乐政治化。因为你公关不公关，一个中国原则都在那里，不增不减，不容挑战。每一颗爱国心，都值得被小心安放”（风传媒，2016）。《环球时报》在同日的微博也表示，“我们的爱国之心，绝不是什么‘暂时的情绪’…这是在中国网友心中会跟随中国走向强势复兴一路的坚定信仰”。《环球时报》同时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这次对阵台独势力，中国网友完胜”；并指出周“被卑鄙的人当做一次性炮弹，去冲撞13亿同胞铁铸的底线”，并鼓励周“不要怕他们，勇敢地去最闪亮的中华之光吧”。这个回应显然是针对台湾媒体封周子瑜为“台湾之光”而言的，1月16日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对台湾有些政治势力利用两岸民间交往中的个别事件，挑拨两岸民众感情，两岸同胞要高度警惕”（搜狐新闻，2016）。

周子瑜道歉以后，台湾的媒体和网民公开为周子瑜抱不平。如台湾的《三立新闻》网在1月15日引用网名的原话指出，“这跟IS人质被处决前念的声明有甚么差别，都面无表情的念稿子，除了差在一个念完后被砍头而已”；并且公开批评“JYP去跪舔人民币”（三立新闻网，2016）。《自由时报》痛批这就像被“IS胁迫般，孤单、略带惊慌地站在录像机前‘自我忏悔’”，并且引用网友的话指出这是马英九政府“八年来标榜两岸关系六十年最好的‘耻辱柱’”，更多网友说要用选票

为台湾讨公道”（自由时报，2016）。

1月16日，中国大陆演员林更新在微博上转发周的道歉视频时调侃“道歉来得太突然，还没有来得及背稿”。台湾网民认为林“落井下石”，第一时间攻占其Facebook，并扬言要在台湾封杀他。比如一个名叫林采萱的用户发言，“中国是台湾的，地球仪是中国的，欢迎来到台湾中国”。由于很多言论涉嫌台独，很多大陆网民翻墙去Facebook支援林。另外一个台湾演员罗志祥引文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致使他的脸书页面受到了台湾网友的攻击，这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大陆网友的反击。

第四，帝吧事件是对中国身份在美国和日本地缘政治中的一种忧虑。由于此次事件是在台湾大选期间发生，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台湾总统马英九回应周子瑜事件，指出指两岸人民情感不该受挑拨；对于国旗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伤害；并且“真心拥抱中华民国的人，当然不是支持台独”（BBC 中文网，2016）。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1月15日台中“点亮台湾每一里”的记者会上表示拿国旗是国民的权利。2016年1月16日为最后的投票日，有台独倾向的蔡英文以大幅选票优先获胜当选总统。蔡英文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周子瑜事件“引起了不分党派台湾人的普遍不满”（储百亮，王霜舟，2016）。从某种程度上，周子瑜事件已经完全超越娱乐本身，而成为了台海两岸的政治事件。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持续发酵的周子瑜事件为民进党拉了至少50万选票。此次事件不仅彰显了大陆和台湾对国家认同的差异，也彰显了中国近年来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网络的传播，而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因此大陆网民声称“台独不绝，帝吧不死…有人的地方，就有帝吧”。

第五，帝吧事件通过戏谑、调侃的方式将政治娱乐化。网络空间的出现给中国的民众一个有限的过去没有的渠道去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尽管中国的网络存在审核机制，但是民族主义的言论还是能够得以保留（Gries, 2004; Shirk, 2007）。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草泥马，到对各种红色经典的重改，戏谑文化不仅是对权威的反抗，也是通过自我调侃、在网上与他人建立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刷屏、表情包是以一种玩乐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参与的人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进行一种民族身份的表演，而且这种表演被视为是有历史意义的。比如，参与者强调了这是一次交流，不能骂人，要有理有节。比如，一个名为“你又不是Sandy”的用户指出“几十年后的历史书‘思想文化运动’一章：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FB表情包大战”。很明显的，他们将自身的参与置于一个宏大

的历史潮流中，认为自己在虚拟的空间正在创造重大的历史。

最后，由于中国有大批的留学生参与其中，表情包的主要信息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尤其是英文和日文。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英语国家和日本有大量的留学生，而且语言选择有地缘政治意义：留学生希望日本和美国看到中国大陆民众对台独势力的抵制。这些留学生有机会接触台湾人，能亲身感受到大部分台湾人对中国的不认同，这与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很多大陆人对主权和台湾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从而造成一种无力感。比如，有留学生写道“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对你们有了感情，你们教育却让你们讨厌我们。我们称呼你们为台胞，一母同胞，你们却叫我们支那”。中国经济的强盛，使留学生对中国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也能随时感到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言论不自由在西方世界所受到的批评。比如，部分留学生声称出国以后更加爱国。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一种集体行动来造成一种认同感。这表明这种民族主义的表演是一种开放的、跨越边界的表演，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华人”身份认同的想象。留学生一方面代表一种跨越边界的地域和文化流动，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新的语言与身份边界。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表演不仅是让台湾人看到，也是希望非中文使用者看见。他们希望通过美食美景，展现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从而网络成为一种身份认同较量、角力、斗争和表演的场域。并且，留学生在外的文化碰撞，看到中国大陆经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以及外国的各种不如意可能更进一步激发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大陆丰富的影像资料和众多的人口成为中国文化优越的一种象征。让大陆网民能“碾压”台独。并且，源自中国网络空间的行为具有能动性，网民“为自己出征”而不是依靠权威和官方媒体来告知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这点来讲，这个事件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事件尽管给双方提供了一个短暂交流的平台，但是“防火墙”的存在本身阻隔了台湾和大陆网民的交流，并且这个事件很快平息，大陆的民众再次退回墙内，使得持续的沟通交流再次缺失。而且，事件中使用的父权语言展示了中国网民和官方话语一样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表明政治娱乐化的民族主义背后依然是同样的一套霸权体系。

九、结论

本文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必须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框架和大的国际国内的背景下来了解。民族主义在塑造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很多民族主

义者对中国大陆政府不能在国际社会上维护中国的利益有很多持批评声音，并转而批判中国内政的腐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发泄对整个中国社会现状不满的一种安全阀门，它不仅维护了政府利益、也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民间的不满情绪。

但是，另外一方面，Bauman (1995) 认为民族主义是精英控制大众的一种工具 (Bauman, 1995)。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归属感属于唯一的权利，忠诚作为一种无上的义务；尊严只是存在于集体的荣耀中；私利和集体福利联系在一起” (Bauman, 1995: 147)。从这种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控制工具和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警惕民族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被利用而成了压制不同言论、维护特定群体利益的工具。

网络作为为数不少的公民表达意见的场域，不可避免地反应了整个社会的一些议题和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往往是极端言论的放大器。网上的声音不见得反应真实的民意。纯粹从网络言论推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不完整不客观的。尽管网络民族主义确实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将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置于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里面来理解。网络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这种表演不仅根植于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且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中国人、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身份认同等）的一种应对，是国内和国际力量，政治和经济文化以及官方和民间因素的一种结合体。

(责任编辑：张萌)

注释 [Notes]

1. 乌有之乡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大陆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并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的一个政经评论网站。该网站发表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和支持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文章，并在线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乌有之乡网站自上线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该网站是“文革遗毒”“毛左大本营。”2011年该网站开展“十大汉奸”的评选活动，要求恢复废除数十年的“惩办卖国贼”条款，并发起联署，但大众的反应并不热烈。该网站于2012年4月被中国当局关闭。其他左派网站如毛泽东旗帜网、毛泽东网、四月网，红色中国网等也遇到了相似的命运。
2.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一艘班轮。1993年7月，美国声称银河号载有违禁化学物品运往伊朗，并威胁如中国政府不采取措施，就对中国实施制裁。通过一系列的交涉，后来中国同意在第三方参与下检查货轮。后来沙特和美国的联合调查组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但是银河号被迫停航一个多月，给中国造成了经济损失。美方给出的解释是情报错误。此事引发了

中国媒体和社会对美国霸权和中国外交软弱的强烈批评。

3. 比如, 2005年3月至4月间, 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活动, 主要是反对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尽管当局开始允许游行示威, 后期逮捕了几十名组织领导者。2012年中国又因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再一次发生反日游行。政府开始也是对游行采取默许或者暧昧的态度, 但是后来当局势有可能失控时, 政府再次逮捕了游行组织者。比如, 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 被检察机关以“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 几个月之后释放。

中文引用文献 [Chinese Reference]

- BBC 中文网 (2016). 周子瑜事件持续发酵两岸三地反应强烈. 检索于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1/160116_taiwan_chou_tzu_yu.
- [BBC Chinese Website (2016). The Controversy over Chou Tzu-yu continues with Strong Reactions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1/160116_taiwan_chou_tzu_yu.]
- CNNIC (2016).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检索于 <http://www.cnnic.net/hlwfzyj/hlwxbzg/hlwtjbg/201608/P020160803367337470363.pdf>.
- [CNNIC (2016).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www.cnnic.net/hlwfzyj/hlwxbzg/hlwtjbg/201608/P020160803367337470363.pdf>.]
- 储百亮, 王霜舟 (2016). 台湾艺人周子瑜为国旗事件道歉, 岛内强烈反弹. 检索于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7/c17taiwansinger/>. Accessed Oct. 31, 2016.
- [Buckley, Chris & Wang, Shuangzhou (2016). Taiwanese singer Chou Tzu-yu apologized, Causing Strong Reactions in Taiwan. Retrieved from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7/c17taiwansinger/>. Accessed Oct. 31, 2016.]
- ET today (2016). 周子瑜道歉, 陆官媒: 这次对阵「台独势力」大陆网友完胜. 检索于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116/631777.htm>.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6.
- [ETtoday (2016). Chou Tzu-yu apologized and Mainland Official Media: Mainland Netizens Had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over 'Taiwan Separatist Forces']
- 风传媒 (2016). 《人民日报》评周子瑜道歉: 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 检索于 <http://www.storm.mg/article/78704>.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6.
- [Storm Media Group (2016). People's Daily on Chou Tzu-yu's Apology: The One-China Policy Should not be Challeng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orm.mg/article/78704>.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6.
- 江泽民 (2000年). 《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 检索于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9/4494496.html>.
- [Jiang, Zemin (2000). The New Environment Fa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9/4494496.html>.]

劲草 (2015).《台湾独立运动前奏曲》.五南出版社.

[Jincao (2015).*The Prelude of Taiwan Independent Movement*. Wunan Press]

三立新闻网 (2016).为国旗事件公开道歉 网友心疼周子瑜:跟IS人质有啥差别.检索于<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8767>.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6.

[Sent.com (2016). Chou Tzu-yu Apologized for the Flag Controversy, Making Netizens' Heart Ache: This is no different than IS Host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8767>.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16.]

搜狐新闻 (2016).国台办就周子瑜事件表态.检索于<http://news.sohu.com/20160116/n434743864.shtml>.

[Sohu.com (2016, Jan. 16).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s Comments on Chou Tzu-yu. Retrieved from <http://news.sohu.com/20160116/n434743864.shtml>.]

人民网 (2016).中国留学生最喜欢的目的国和最青睐的专业.检索于<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610/c1053-28424138.html>.

[People.cn (2016). The Most Favorite Countries and Majors for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Retrieved from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610/c1053-28424138.html>.

王洪喆, 李思闽, 吴靖 (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11).

[Wang, Hongzhe, Li, Simin, & Wu, Jin (2016). From Fandom to “Little Pinkos”: The Produc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under New Media Commercial Cultur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1).]

王喆 (2016).“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11).

[Wang, Zhe (2016). D8 Goes to Battle, Nothing Will Grow: Cybernationalism as Emotional Online Ga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

严思祺 (2014).台湾民调:台独支持率攀新高.检索于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7/140714_polls_tw_independence.

[Yan, Siqi (2014).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Suppor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Reaches New Height.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7/140714_polls_tw_independence.]

自由时报 (2016).照着稿念…周子瑜“被道歉”.检索于<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49758>.

[Liberty Times Net (2016, Jan. 16). Reading from Script, Chou Tsu-yu Was Forced to Apologize. Retrieved from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49758>.]

英文引用文献 [English Reference]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uman, Z. (1995). Searching for a center that holds.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astells, M. (1996).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UK &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Chao, L. (2005). The red hackers: Chinese youth infused with nationalism. *Chinascopes*, 8 – 13.
- De Kloet, J. & Jurriens, E. (2007). Introduction: Cosmo Patriots. *Thamyris/Intersecting*, 16, 9-18.
- Duara, P. (1993).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26.
- Duara, P. (1997).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4), 1030-1051.
- Gellner, E.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rth, K. (2003).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ette, M. B. (2000).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ries, P. H. (2004).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 B. & Guo, Y. (2000).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ldershot, Brookfield USA: Ashgate.
- Hughes, C. R. (2006).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ant, I. (1795). *Toward perpetual peace*. *Practical philosophy*, 8, 836.
- Kim, Y. (2011). Female Cosmopolitanism? Media Talk and Identity of transnational Asian Women. *Communication Theory*, 21 (3), 279-298
- Levenson, J. (1969). *Modern China and its Confucia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H. (2008). Branding Chinese Product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1125-1163
- Li, H. (2009). Marketing Japanes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6 (5): 435 - 456
- Li, H. (2010). Chinese Diaspora, the Internet, and the Image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 Olympic Torch Relay. *Soft power in China: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Communication (135-156)*. Ed. Jay Wang.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Li, H. (2011a). The Gendered Performance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The Construction of Olympic Misses and Cheerleaders. *Communication Theory*, 21:368–391
- Li, H. (2011b). Parody and Resistanc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n D. Herold & P. W. Marolt (Eds.), *Online Society in China* (71–88). Routledge.
- Li, H. (2012).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the Beijing Olympic Float in the Pasadena Rose Pa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245–2279
- Li, H. (2016). *Advertising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Oxford, UK: Polity.
- Lin, M. & Galikowski, M. (1999).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Norris, P. & Inglehart, R. (2009). *Cosmopolitan communic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globalize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 (1997).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hih, S.-M. (2001).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 (2003). *China's New Order. Edited by Theodore Hu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J. (2005). Consumer nationalism and corporate reputation management in the global era.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2005, 10 (3), 223–239.
- Wang, J. (2006). The politics of goods: A case study of consumer nationalism and media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2), June, 187–206.
- Wu, X. (2005). Cyber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as a McLuhanite message at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8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August 10–13, 2005, San Antonio, TX.
- Zhang, X. (2001). The Making of the Post-Tiananmen Intellectual Field: A Critical Overview. In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X. Zhang.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 (2000).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 (1), 1–33.